

# 我的父亲 吴承惠

◆ 吴 骥

看到题材还不错的,父亲总不忍心放弃,逐字逐句斟酌修改,以至有时几乎到了重写的地步。待到文章刊出,自然还是署名原作者;所以作为编辑,“为他人做嫁衣裳”的奉献精神,父亲对于团队里的年轻编辑,真正做到了言传身教。

父亲吴承惠每次住院都会带着身边的小本子,随想随记。2018年9月26日,他在日记的末尾写道:“本以为吴骥今晚要来,直到8时未见踪影,未免怅怅。”怅怅然,怅怅然,他可知现在的我,是能够盼他“夜来幽梦忽还乡”的凄凄然了!

我因为生得晚,被父亲称作“最小偏怜女”;他毫不吝惜地表达对我的宠爱,我时时出现在他的专栏中,从“休息时断想”,到“不拘小记”。幼时的我,大约就继承了父亲年轻时喜欢嬉玩的脾气,常常夜深了还不肯困倦;此时父亲便会把我抱起,一边哼歌一边哄我,日光灯在我眼前晃着晃着,许久,倦意袭来,我才昏昏然睡去。待得大几岁,我出落得白皙讨喜,父亲更是把我当做“活玩具”:每日下了班,若不应酬,晚饭后他必然会带着我轧一圈淮海路,买个雪糕零食是必不可少;若有应酬,他也每每会带上我,总是母亲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,兴高采烈赴局去。就算不出门,家中也是宾客盈门,虽然那时住的不过是弄堂房子,待客的不过是连独立卫生设备也没有的一个客堂间!这些儿时的记忆,随着父亲文中追忆的师友故人,潸潸然被勾起:清瘦矍铄的侯宝林大师;眼神深邃的孙道临先生;满头银发,长身伟岸的乔奇伯伯;说话特别诙谐的陈希安和金声伯叔叔;秀美利落的王丹凤和神采飞扬的金采风;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冯亦代和黄宗英,等等。我印象深刻的,还有周璇的儿子周中,中等身材,眉眼俊俏颇似其母,虽然沉默寡言,却是家中常客。

每次寒暑假,我都是父亲的小跟班,他几乎每天带着我来晚报上班。彼时的《新民晚报》还在九江路的老楼内,父亲负责的副刊部占了一个大房间,很多年轻编辑,有说有笑,坐得满满当当。每天早上,问候过各位直至现在还保持联系的叔叔阿姨,我就乖乖坐在父亲身边的藤椅上,晃着两条小腿儿,为了打发时间,开始看父亲桌上堆积如山的稿件。中午由父亲带着去食堂吃饭,顺道会去当时还是铅字刊印的排字间逛一圈;等到下午,散发着墨香的大样出来,是我最开心的阅读时刻。十日谈,连载小说,还有百家争鸣的专栏,尤其仰视林放先生的《未晚谈》。还在读小学的我,大多只看得“囫圇吞枣”,不过父亲从小教导,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,爱看书就好。我的语文启蒙,自晚报始。

父亲改稿,喜欢用毛笔蘸了红墨水,圈点划线,字体娟秀,清清爽爽批复在稿件两侧,几乎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。

难忘的故事自然不少。晚报向巴金先生约稿,大约是巴老生前最后的文章。老人家手不稳,字体难以辨认;父亲耐心研读,一篇不过200多字的文章,花了大半天,才誊抄清楚给到排字间。上世纪80年代初,父亲开设了《休息时断想》的专栏,以秦绿枝为笔名,每周一篇,总以两个字为题,每篇不过两三百字,亲切活泼,针砭时弊。父亲虽称之为“生活在下中层的的声音”,这些小文却受到晚报读者的欢迎,契合晚报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办报宗旨。他在自己文字

上的脉脉温情,并不妨碍他作为报人的先锋精神和独到眼光。晚报的十日谈等专栏,都是自复刊迄今的经典栏目:80年代中期,随着海峡两岸交流日甚,晚报作为内地第一家主流媒体,连载琼瑶小说《雁儿在林梢》,首开风气之先;90年代初,港台武侠剧盛行,当时热播的我记得有一部叫做《包青天》,几乎万人空巷;正在思考下一个连载内容的父亲便联系了评话名家金声伯先生,将他一个20多分钟的段子,由父亲捉笔,改编成了小说。因为太受欢迎,竟从原先计划的70回,陆陆续续写到了200回才收笔。

所以我童年记忆里的父亲,是勤恳、快乐且热爱交际的。整个编辑部常常回响着他爽朗的笑声。前辈器重,平辈融洽,后辈爱戴,80年代末他当选全国人大代表,去北京开会。我一路升学,高考,就业,去英国深造,乃至配隐形眼镜和考驾照这样的小事,他都在背后默默操心。搬离了父母家,我开始独立的生活后,我成了父亲日记中心心念念的“骥儿”。2019年5月10日,他住院检查,在日记中写到等我捎来母亲做的菜,然而“骥儿来带不带东西无所谓,我就是想看看她。”直至5月19日我接他出院,戛然而止,成了他留下的最后的文字。

父亲年轻时候吃了很多苦,但是身体却一向很好。毛病虽不少,但俗语云“弯扁担不断”,退休后他依然活跃,饭局会友,票房唱戏,阅读写作,爱看外国电影,逾九旬高龄,还能外出交际应酬。好些年前,我曾买过一支录音笔赠与父亲,希望他能把自己过去的经历口述下来,随想随录,由我来整理成文件。只可惜,父亲却一直认为自己一生实在普通,“没有什么好写的,写出来也是引不起别人的兴趣,白白浪费纸张的”。然而他最终还是在写作《师友追梦》时,织入了自己的故事,但点到即止,只留意味深长。我能理解他,一边因着入世而热闹,但骨子里却还是恃才孤傲;所以握了一辈子笔杆子,留下十数本书作的父亲,最终还是选择了以这种低调的方式和世界告别,并为属于他们的时代,默默地画上了句号。



吴骥和父亲



郝铭鉴先生(右) 作者探望

## 好编辑的一生

# 郝铭鉴

## “咬文嚼字”的大师

◆ 陈鸣华

很多编辑、作者甚至名家“怕”他,因为经他审读的稿件,往往被发现不无瑕疵,甚至犯低级错误;很多媒体包括省市级、国家级传媒“怵”他,因为《咬文嚼字》公布的社会语文差错,往往以他们为例,向他们“开炮”。

4月2日下午,先后收到原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周建宝副社长和中华书局(香港)总编辑侯明女士转发的微信:《咬文嚼字》创始人、出版家郝铭鉴先生因病去世!尽管之前孙欢、吴志刚等朋友告知我郝老师近况不好,已有一些心理准备,但还是非常难过。要知道,1月24日除夕郝老师还与我互贺新年,郝老师乐观地抒情:“让我们一起迎接春天吧!”噩耗使我深陷痛苦,为一位优秀的出版人的陨落而垂泪。

郝老师的出版文化成就,有口皆碑,这两天已不断见诸传媒;其作为编辑家、出版家、语言学家的影响力,毫不夸张地说,就是上海出版界递给全国的一张名片。他给出版界和上海都带来了荣誉,这些荣誉远基于他的个人所得。在他的成就中,《咬文嚼字》是小刊物办成了大天地,《编辑学刊》则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的脱胎换骨;前者从业内走向社会,给城市洗把脸,规范和纯洁汉语运用;后者保持了专业严谨,但出版研究洋溢着鲜活的时代气息,学究枯燥一扫而空。在他身上,交织着既注重传统、一丝不苟又思维活跃、突破创新的两种特质。很多编辑、作者甚至名家“怕”他,因为经他审读的稿件,往往被发现不无瑕疵,甚至犯低级错误;很多媒体包括省市级、国家级传媒“怵”他,因为《咬文嚼字》公布的社会语文差错,往往以他们为例,向他们“开炮”。其中,咬嚼者的风险不言而喻,谁能保证自己不出错不被咬?但事实就是这样,1995年至今,《咬文嚼字》已然成为出版传媒和社会语言病毒的防火墙和测试剂,编辑部评选的“十大语文差错”、“十大流行语”,已具极高的公信力;面向行业传授真经的“咬文嚼字培训班”已逾几十期,将提高书刊编校品质的道义责任担在肩头。职责、勇气、坚持,把专业和认真做到极致,就是咬文嚼字精神,而其灵魂,来自于一个杰出出版人内心对文化和出版事业的挚爱和终生追求。文艺社老社长江曾培曾感慨:有些事,就是需要核心、灵魂才能做到,没有郝铭鉴,《咬文嚼字》难有今天的成就!的确是这样。

原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员工应该还记得,全社工作大会,社长总编们讲发展规划和业务分析,各有风采,其中

郝老师的发言,往往形象生动,使人印象深刻。如讲发行工作,先介绍木桶原理:木桶容积大小,取决于其最短的一块板;我社出版工作中最短的一块板,就是发行。把选题是基础、发行是关键的道理,一下子讲活了。至于发展策略,他以“巩固根据地,占领制高点,寻找突破口”的军事原理来形容出版的基础业务、骨干业务和创新业务,使大家对业务层次和重点项目的认识一下子有了提升,思路方向变得清晰。有时候他又很风趣,说人一生要努力遇见三个好人:一个好领导,一个好朋友,一个好老婆,以此指点青年同事怎样处理好工作、事业和家庭的关系。

除却业务水平的精湛高超,日常生活中的郝老师,是厚道、善良、平易近人,甚至好“欺负”的,每每聚餐时,同事们都会嚷着要他这个美食家点菜,而他一定会问过每个人的喜好、忌口,对荤素、营养做色香味搭配,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。完了,常常还乐呵呵地接受爱开玩笑的同事对菜单的“挑剔”,就当是“咬文”遭遇“嚼字”,甚至个人掏腰包埋单。严于律己、宽于待人,是郝老师的性格特点。从他身上,你会更加理解出版工作的专业严肃,同时,善意、快乐和信心也从不缺失。

郝老师也是我从事出版工作的领路人之一,在几个关键处他几次提携帮助我成长进步。1987年,社里成立文化发展部,从文艺社、文化社各选了几名同事,当时24岁工作才两年多的我也在其中,后来得知是郝老师推荐的。1994年,《文化与生活》转成了中日合作的流行时尚期刊《HOW(好)》,《HOW(好)》在郝老师的统筹下兴旺多年,我后来追随他当过并列主编。《HOW(好)》鼎盛时发行量达10万册。

1999年-2004年我担任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副社长,分管发行印刷等经营管理工作,其间也策划一些图书,因为郝老师的支持,大都以文化社书号出版。2004年因组建文艺集团,我接郝老师的班主持文化社工作,他细致地向我介绍文化社的出版、经营以及人员情况,特别叮嘱办好几件涉及作者书稿和权益,必须认真善后的事宜。这些情景,历历在目,至今觉着温暖。